

鲁迅杂文艺术特色探究

——以“热风期”和“自由谈”杂文为例

◎武媛媛

(河北金融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5)

彭定安在《鲁迅杂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中将鲁迅早期杂文称之为热风期杂文(1918—1924,以《坟》和《热风》为代表),将《二心集》到《花边文学》这一阶段的杂文称为高峰期杂文。本文则将鲁迅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后来结集为《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部分杂感称为“自由谈”杂文。早期的“热风期”杂文和高峰期的“自由谈”杂文,鲁迅的创作内容和写作风格,既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写作习惯,又有相互差异。

一、信手拈来的题材来源:“报刊杂文”和“故事杂文”

鲁迅思维敏捷,知识丰富,手边、耳边、眼边所能触及之处,皆能生发开去,演绎为具有丰厚深刻文化批判意识的杂文。就像他自己所说:“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梳理“热风期”和“自由谈”时期的杂文,因来源于报纸杂志信息而引发随感议论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尤其是“自由谈”时期。《论睁了眼看》由于作者看到了《猛进》第十九期上虚生所作的《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一文而想到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恰恰是“睁了眼看的勇气”,之后的《坚壁清野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随感录》(三十三、三十九、四十三、四十六)也都来源于报纸杂志所刊录的内容;而到了《准风月谈》,其中的《推》《我谈堕民》《“推”的余谈》《冲》《踢》和几乎整个《花边文学》中的杂文题材均来源于报纸杂志所登载的信息时事。“热风期”杂文中除了《坚壁清野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就事件谈事件外,大都生发开去,侧重文化心理批评;而“自由谈”杂文则大都选取典型事件侧重社会批评。

鲁迅从小热爱民间艺术,这在他的小说、散文中都有所体现。同样,民间流传的故事、百姓逸话和戏曲艺术也成为他杂文创作中不可忽视的素材。《论雷峰塔的倒掉》通过家喻户晓的白蛇娘娘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对自由婚姻的迫害和扼杀;《论照相之类》则选取了幼小时候S城里祈祷眼光娘娘的民间习俗;《二丑艺术》则以浙东戏班中的“二花脸”即“二丑”形象刻画了现实中的帮闲文人的无立场、无节操,向统治者献媚讨好的丑陋本质。《谈蝙蝠》和《知了世界》分别运用了伊索寓言和法国诗人

拉封丹的寓言。在引用这些题材时,“热风期”杂文基本以叙述故事作为例证,而到了“自由谈”时期,鲁迅则做到了“叙中有论”,以新的观念、“我”的观念重新审视古老的故事。

二、关注同一主题,变化表现方式

鲁迅在“热风期”和“自由谈”时期曾关注过共同的文化主题,但在表现方式上逐渐老练。

1.关于妇女观——从直接到晦涩。这一主题的杂文有《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随感录(四十)》、《女人未必多说谎》和《男人的进化》。在阐明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态度时,鲁迅在“热风期”多直接地慷慨激昂地陈词,重论述。文中常常以“我以为”、“我希望”、“我看”、“我想”、“我觉得”等主观性很强的字眼来表现自己“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激情;而到了“自由谈”时期,鲁迅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政变和文学论争,思想更加成熟。同时,国民党对进步文艺实行反革命围剿,文章不得不采用隐晦的措辞,“说话也往往很晦涩”,重在讽刺艺术。

2.关于儿童观——从口号宣传到启发警示。这一主题的主要杂文有《我们怎样做父亲》《随感录(二十五、四十九)》和《我们怎样教育儿童》。鲁迅早期相信进化论,在“热风期”杂文中提出了鲜明的解放儿童、教育儿童的观点;而“自由谈”时期鲁迅则不再重复申明主张,而从儿童教科书与儿童教育的相关问题入手,启发、警示世人。鲁迅希望他的文章能与时弊速朽,可时弊依然存在时,鲁迅不会毫无意义地重复口号,而是旁敲侧击、由表及里,却不改初衷。

3.关于新旧论争——从针锋相对到嬉笑怒骂杂文。这一主题的主要杂文有《估学衡》《所谓“国学”》《望勿“纠正”》《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古书中寻活字汇》《正是时候》以及和施蛰存关于《庄子》《文选》论争的杂文。鲁迅在“热风期”反对复古派和守旧派的进攻时正是新文学尚未立稳脚跟之时,因此要想确立新文学的正宗地位必须全盘推翻旧文学,从而体现出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特点。复古派、守旧派卷土重来时,统治阶级妄图利用封建思想加强愚民的思想统治,而这时旧文学和新文学相比早就没有了立锥之地,再提倡旧文学就等于“开倒车”。针对这样一种风气,鲁迅后期的杂文就形成了一种不温不火、嬉笑怒骂的特点。

4.关于文学批评问题——从批旧到建新。主要有《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批评家的批评家》《漫骂》《看书琐记(三)》和《骂杀和捧杀》。“热风期”,鲁迅否定文坛上刚刚出现的批评家旨在抨击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和假道学;而“自由谈”时期,鲁迅谈批评,讽刺不良的批评现象旨在建立规范的文学批评标准和批评原则。

5.批判国民性——从内到外。主要有《论照相之类》《论睁了眼》《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的奇想》《打听印象》《外国也有》和《朋友》。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前期鲁迅剖析这个问题时是从中国人本身找根源;后期他则用了更为宏观比较的方法,从中国人对外国人、外国文化的态度上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讽刺。

6.关于外国文化——从吸收到创造。主要有《随感录(四十三)》《随感录(四十六)》《禁用和自造》《偶感》《玩具》。“热风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鲁迅大力提倡吸收外国文化中的进步东西,可是中国的保守力量之强大,抵御外来思想之顽固性,往往使先进文化被中国人异化。因此,鲁迅曾经说过:“可怜的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的染缸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自由谈”时期,鲁迅则不只是希望外国文化被吸收,在中国健康成长,更重要的是鲁迅提出了创造,即在模仿外国基础上的创造。

三、多样化的杂文文体形式

鲁迅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是“创造新形式的急先锋”,在杂文写作中也尝试了多种文体。

1.规范的议论文文体。如《文化偏至论》《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这些杂文都有清晰明确的论点、论据、论证,是非常完整的长篇议论文。像《文化偏至论》在中西文化发展的平行对比中提出论点,即19世纪文明的偏至现象:“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含蓄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物质,遗精神。”紧接着又论述如何改变文化偏至现象。即“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我之节烈观》则有着严密的论文结构:首先绪论部分指出了“节烈”提出的背景,其次正论部分用连续十个提问形式进行驳论,驳不节烈国将不国论、女子祸水论,驳节烈的效果,驳节烈道德论,驳男子表彰节烈的资格、分析节烈产生的根源、通行的原因和不改革的原因。最后,作者结尾发愿,提出论点。

2.演讲体杂文。《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这两篇演讲层次清晰,论点鲜明。他在这两篇演讲体杂文中分别提出了明确见解:妇女解放首先要争得经济权和“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未有天才之前》同时还具有论文的基本框架:先提出观点,再驳斥社会上“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的论调,最后提出

民众如何做培养产生天才的泥土。演讲体杂文是鲁迅杂文中一种特点鲜明的杂文体式。针对不同的受众、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不同的演讲处所,鲁迅的演讲体杂文的内容、风格和论证方式也都有不同。

3.随感录体。《随感录》体杂文大都集中在《热风》中,都是单刀直入、简洁明快地直抒己见,犀利尖刻。虽然“自由谈”时期的短评在体式长短上和《随感录》相似,也都是因事而发的感触,但“热风期”大都还停留在泛论中国文化时弊,是“直感的生活经验”,而“自由谈”杂文则由具体事件生发开去,“用很平常的小事,射影到很大的问题”。它更集中地表现了由一点向不同的领域扩展和由不同的领域联想到一个共同点这样旁征博引和收放自如的特点。另外,在“自由谈”杂文中已经很少见到“热风期”杂文中平白直露的个人主张、发愿,而是将含义隐藏于史实、故事和事件背后,在若隐若现之间跳跃。

4.抒情散文诗体。《生命的路》《为“俄国歌剧团”》《夜颂》和《秋夜纪游》这一类杂文,和《野草》相似,可称之为抒情散文诗体。这几篇杂文诗情浓郁而少议论。虽然少了剑拔弩张,但感情的浓重却丝毫没有减少鲁迅杂文的战斗力。正如唐韬说:“鲁迅是一团火,有人遇到了要被灼伤,甚至至于烧死,也有人感到温暖,从那里汲取力量。”也正是这一类文章让我们窥见了鲁迅心中的悲愤所淤积的力量。“热风期”杂文和“自由谈”杂文不同的是,前者体现出更多的诗人气质和乐观向上的基调,《生命的路》中写道:“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这种深沉的哲人、思想家式的语言,在前期并不多见。

5.小说体杂文。鲁迅杂文中唯一一篇小说体杂文就是《智识即罪恶》。1921年5月19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教育上的反智主义》宣扬虚无主义哲学。为了避免青年受到这种学说的误导,鲁迅以小说的形式和持这种观点的人开了一个玩笑,并发表在《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里。小说三要素在《智识即罪恶》中皆有鲜明体现。人物为“我”,一个给酒馆打杂的伙计。情节:“我”因为听信了“智识即罪恶”的观点被老师赶走,死后又在地狱受罚,最后又离奇地回到人间。

【参考文献】

[1]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武媛媛(1979—),女,河北抚宁人,硕士,河北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李佳怡]